

商品经济与 中国近代民族经济进程

陈庆德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商品经济与 中国近代民族经济进程

陈庆德 著

责任编辑:崔继新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品经济与中国近代民族经济进程/陈庆德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01-009292-8

I. ①商… II. ①陈… III. ①商品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F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5661 号

商品经济与中国近代民族经济进程

SHANGPIN JINGJI YU ZHONGGUO JINDAI MINZU JINGJI JINCHENG

陈庆德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9292-8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言

出于偶然,我踏上了学术之路。幼年因父被划右派流死异乡无名地,有失于家道之传,而于世间茫然觅读。历八载钢花铁水对青春的磨练,1978年始沾高等教育之恩露,恩师董孟雄成为我最初的领路人。在大学本科的后三年中,我从恩师家中的书架上翻阅到一些有别于新闻宣传或一般性教科书的研究专著,点燃了进入历史领域探寻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发展缘由的兴致。然而,对于走上学术之路的我来说,最大的幸运,则是在大学毕业两年后,再次投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学于彭泽益先生门下。我永远铭记在心的是:初次相见时,先生关于心无旁骛是研究之基点的告诫;在学期间,先生对“爱惜自己学术名誉”的谆谆教诲;学成离别时,先生以“不要对自己期望值太高”的话语而给予的深切开导。应该说,三年所承仰的先生之恩泽,已凝炼成我三十而立后的生涯的一条基准线。

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汇聚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代宗师。我们的专业课,是由这些先生们以专题的形式一人一讲来完成的,这便使我们得以直接领略到经济史宽广领域中的许多精湛见解。先生们授课风格各异,以当时我的兴趣与志向来说,最喜欢的是吴承明先生充满理论思辨性的讲述。先生们或是以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或是以缜密的逻辑和数据发出的追问,甚或以我当时的浅薄尚不能会意先生们的论说,以至以我当时年轻人“一知半解的洞察”而与先生们的某些见解形成抵牾……然而,无论是稍后进入写作毕业论文的期间,还是在此后二十余年的学术道路上,我愈来愈深地体味到先生们的学术魅力,也愈来愈多地受惠于先生们的学术感染力。正是这种学术魅力梦萦魂绕般地伴随

着、支撑着我走过了这一程学术之路。我得到的最大收获在于：初步感受到了广阔的视野、宽厚的胸怀对于学识探问的重要意义。何为学术？如何进行学术？似乎已隐然植入心田。

正是在这种当下已不多见的儒雅之风的熏陶下，入学半年后，我作为听课心得的《对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再认识》，在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科学奖评选的三个一等奖中忝列一席。此奖在当下行政级别的排列中或许微不足道，但我珍视它，因为它向我表明了，学者的根本或许就在于他始终是一个询问者、探路人；总是面对不确定性发出质疑，以求得到回应、甚至期盼在诘难的形式下得到启迪，而非卫士或其他什么别的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良好的学术氛围令我欣喜，也同时使我对学术充满了敬畏。我最初的学位论文选题是《中国近代商业资本的生存基础和社会作用》，正是这种学术的敬畏之心，促动我不得不去思考此选题后面更深和更基本的理论问题。而这些思考，成就了发表于《哲学研究》1987年第5期的《生产力性质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发表于《争鸣》1987年第6期的《商品经济新论——中外商品经济历史发展之比较》。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点，循着农业、手工业等不同的领域，从一个个的问题出发，我开始了论文的写作。历经两年，在由问题的思考而带来的快意中，论文的写作不知不觉已逾10万字，而以《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研究》提交答辩。这一写作过程使我获得了从未体验过的快意和满足；也使我清晰地看到以项目为基点的研究和以问题意识为基点的研究在实践中所可能产生的天渊之别；最重要的是，我的学术态度和治学方法借此过程而得到了最初的定型。

多年来，吾友林文勋学兄一直鞭策我整理十余年间的经济史研究成果，我内心深怀感激。可我总觉得，“整理”有文饰之意味，最终决定奉上我学术之路的这个起步之作。起步之作无疑是稚嫩的，但是，若这些稚嫩之词经二十余年的沧桑变化，仍不至使人感到味同嚼蜡而归入无意义之列，我就足以欣慰了；更重要的是，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如果在一个人的起步之作和后续的所为中，能够看到某种学术追求的一致性和理论思考的

连贯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尽管他或许没有得到功利追求之辉煌,也没有明星升起的炫目之光,但起码他在生命实践中获得了最不易得到的自我满足感。正是这一起步之作,支撑了我十余年的经济史研究,在保持论文原样的基础上,我把为撰写学位论文而展开的两篇理论思考和论文完成后所进行的三份拓展性研究以附录的形式一起问世,作为我对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总结吧。

我窃以为,一个人一生坚守一个领域,追求一个事业目标,固然令人敬佩,但能够去接触前所不知的新领域,努力去理解前所不能理解的新问题,或许是其关注点更多地移向了有限生命与无限世界的关联中,这未尝不是一个至少是同样好的意义选择。无论我走向何方,总是带有这学术起步的印迹,正是这一学术起步,不断推动我走得更远。把自己的前期研究作一总结的意义在于,追念师恩!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无论是直接面授予我感染的前辈,还是素未谋面却以激扬文字给我学术震撼的大师,甚或是日常交往中给我启迪的朋友,正是你们,浸润着我的人生态度,锤炼了我的学术精神。有缘相识于你们,是我一生之大幸。

陈庆德乙丑年夏于昆明龙泉居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商品经济形式的一般历史性质	1
第二节 商品经济形式的生存基础和社会作用	3
第三节 中国历史之谜	6
第二章 鸦片战争前清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	8
第一节 清代商品经济的扩散化发展道路	8
第二节 清代商品经济扩散化发展的促动因素	17
第三节 清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22
第三章 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	40
第一节 世界经济联系的建立	40
第二节 白银外流与社会财富的枯竭	43
第三节 近代中国市场条件的演变	48
第四章 近代小农经济的分化与商品经济的低层次扩散	52
第一节 中国近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52
第二节 近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组织结构	59
第三节 近代农业经济商品化的社会性质	68
第五章 近代中国商品生产主干——手工业的演变	78

第一节 手工业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78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贫困化与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	86
第三节 近代中国手工业的发展趋势	95
第四节 手工业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转变	112
第六章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式在近代中国的变异	119
第一节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式中的三重结构	120
第二节 三重结构的变异与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式片面化发展的 局限	130
第三节 中国近代资本形态转化道路的阻塞	137
附录一 生产力性质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	153
一 判定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本质要素	153
二 从世界范围看封建经济结构的资本主义转变	157
三 中国历史之谜：“停滞”与发展	160
四 中国的近代化转变与现实的思考	166
附录二 商品经济新论——中外商品经济历史发展之比较	172
一 商品经济形式的一般历史性质	172
二 商品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差异性	174
三 商品经济形式的生存基础和社会作用	178
四 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180
附录三 洋务运动的再认识	182
一 封建自救与工业化起点	182
二 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	189
三 独立发展与对外依附	193
附录四 清代云南矿冶业与民族经济的开发	197
一 清代云南矿冶开发的规模与产量分析	198

二 清代云南矿冶开发中的人力资源分析	203
三 清代云南矿冶与民族经济的开发	208
附录五 皇权制度的二重性与中国民族经济进程	216
一 皇权制度的社会起源及其基础构建	218
二 皇权制度二重性的历史演变	221
三 皇权制度下的市场结构与运作	226
四 中国民族经济的中心—边缘开发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239
参考文献	247

第一章 导 言^①

正确地提出问题,常常比正确地回答错误的问题,
更为重要。

——阿尔温·托夫勒

商品经济形式在现代社会中显著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长期以来,人们困惑于那些令人炫目的表现形式之中,不少理论家把它作为某一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普遍地把所谓“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对立,作为划分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这样,商品经济形式发展的丰富多采的历史性质被抹杀了。仿佛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更,全赖于这一经济形式的发展。这种理论见解,不仅造成了人们对商品经济形式本身的莫大误解,而且在如何说明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转变问题上也遭遇了理论和历史的巨大挑战。

第一节 商品经济形式的一般历史性质

从有形的物质财富的直接产出这一角度来看,这种表现为纯粹流通过程的经济形式,只不过是已生产出来的物质要素的转移和一定价值量

^① 作为本章的理论论述,可参见作者所写的《生产力性质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载《哲学研究》1987年第5期;《商品经济新论》,载《争鸣》1987年第6期。

的形式变换。因此,在历史上,代表这一经济形式本质特征的商品流通,曾被古典经济学认为非生产劳动。但是,从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出发,完成这种形式变换的流通过程,本来就是社会再生产一般过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和必要要素。因为人类生产总是要依凭一定的交往关系和交往结构才得以进行。各个个别生产的有形产品,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劳动交换形式,才能成为现实的社会财富。自从人类脱离原始的单纯生存状态而趋向于有意识的发展开始,不但今天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所产生的人类理性选择,要求借助于商品经济形式来获得更大的财富权益;就是在被较低生产能力所限制下的远古部落,更需要借助这一经济形式,以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来弥补群体自身片面性生产的不足,而获得人类最初由单纯的生物生存走向有意识的发展的基本手段。因此,作为人类社会交往关系和交往结构表现形式之一的商品经济形式,获得了历史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说,这一经济形式以流通表现出了非生产的性质,那么,人类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在本质上就已包含着非生产的职能。可见,一方面,商品经济形式的存在并非可有可无。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为不同层次或阶段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服务,使社会再生产的循环得以实现。

从商品经济形式自身的发展来看,商品以其自身价值形式不同层次的发展,显示了交换关系成熟完善的历史过程。在这种交换关系的发展中,每一更高层次上已完善起来的价值表现或流通的形式,并不排斥原来低层次上旧有生产所提供的商品,而是使各个不同层次的生产方式所生产的商品,融汇在已完善起来的流通形式之中。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得到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形式,是一个古老的经济形式,从人类生产力一开始提供相对剩余生产物之日起,它就出现了。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还是公社的产品,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都可以交错在一起,构成一个总的商品流通和商业资本的运动。这种运动既不要求生产者一定要隶属于某种特定的经济成分要素(如资本),也不要求这种要素一定

要直接支配生产过程。这一总体运动,“按它的性质来说,包括一切生产方式的商品”。^①显然,仅以这一经济形式本身是不能说明一定社会的生产基础的。它不足以作为判定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要素,我们也就不能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标志,简单地归为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与否。

商品及其流通,作为一种古老的经济形式,无非是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进行劳动交换,社会产品分配借以实现的一种交往形式而已。但是,这种经济形式既不是社会产品分配的唯一形式,也不为某种社会经济形态所特有。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产品,一旦进入流通来实现自身的社会分配,就马上成为商品。在人类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各个阶段上,商品经济形式从未能把其他经济形式完全排斥开来,任何一个层次上的社会经济结构,也从未以商品经济形式为其唯一的历史表现形式。要真正了解商品经济形式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性质和作用,不仅必须掌握这个经济形式的一般历史性质,承认这一经济形式历史存在的普遍性,而且必须对它的生存基础这样一些深层的本质内容,进行历史和理论的考察。

第二节 商品经济形式的生存 基础和社会作用

既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②那么,人为地给商品经济形式冠以某种特定的社会性质,就势必把它看成其他社会心态所不相容的经济形式。这样,便不能正确解释这一经济形式发展的历史进程。商品经济形式作为人类社会交往的形式之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3页。

一,事实上是可以生存于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基础上的。

我们暂且以封建社会为例来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在个体地域性生产力基础上,自然地域关系的局限,使封建社会一开始便以对某种原料或手工艺独占的关系来组织生产。这种局限性的片面生产与各个小生产者不断发展着的全面性需求相冲突,客观上就使交换成为这一生产方式内在的组成要素之一。特别是在资源和个体小生产自身发展极限的约束下,当原来的某种主要生产短缺时(这种短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原有的主要生产不能完全吸收现有的劳动力资源,一是其产品不足以供给生产者的基本需要),小生产者就更需要超越自身直接需求,而进行其他的专门性生产,并通过商品经济形式来实现自身再生产过程的供求平衡。商品经济形式就这样成为封建社会中一个普遍的历史存在。这一经济形式并非每时每刻都与封建社会相对立,也并非从来就是封建经济结构的腐蚀剂。在不同的历史基础上,它所发挥的社会效应是极不相同的。

以中外历史而论,在欧洲封建历史中,香槟集市的大规模商品交换,曾一度繁荣了佛兰德尔地区的庄园经济。在16—18世纪,商品经济形式在英、法、荷等国的发展,推动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长。特别是英国在17世纪所进行的世界性商业扩张,直接带动了近代工业化的演变,在它演变的基础上,商品经济形式成了摧毁旧经济制度的有力武器,发挥着促进社会变革的革命性作用。“同英国的商业相反,俄国的商业则没有触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①在同一时期,同样是进行粮食的商品化生产,但是,在不同的历史基础上,英、法等国以此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德国大规模的商品粮生产促成了“再版农奴制”的复活,在波兰带来的直接后果却是农奴劳动需求量的成倍增长。在中国则更有一番不同表现。商品经济形式在中国产生甚早,“在公元前5世纪,广泛的国内贸易和各种商利贷的流行,促进了一种商品化农业的发展,这种农业表明地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3页。

租、税收、价格和利息等各种力量开始相互作用”。^① 在这一过程中,商品经济形式及其职能形态商业资本的运转,从来就是封建个体地域性经济结构生存的历史前提之一。且不谈土地买卖的交换活动造就了地主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小农再生产过程的实现,以至整个社会统治机制的运转,都在一定程度上要借助于商品经济形式的联系。在佃户与地主之间,在国家编户下的各类小生产者、商人及地主与皇朝政权之间,社会产品的初次分配是以实物形态为主的直接交纳而完成的。整个统治机制的运转,首先就要求把这些实物通过商品流通渠道转化为各级官吏的俸禄和各级官僚机构的日常费用。同时,整个社会不同种类(货币的或特定实物形态的)和不同阶层的收入,也要求把各个个体收入的特定的片面形态,通过商品交换转为多种多样的生产和生活的全面需求品,以实现社会产品的最终分配,并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运转。从统治政府这方面看,虽自秦汉以后,政府已形成并发展起一整套“重农抑商”的本末政策,但它从未能把商品经济形式摒弃于社会经济活动之外。反而,自西汉的盐铁官营开始,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独占了一切最有利可图的工商活动。所谓“重农抑商”,并非弃商灭商,而是以此控商之权而集商之利为国家之财源。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商品经济形式的生存基础不同,表现形式各异,社会作用及结果也大不相同。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历史过程中,尽管它的发展“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但是,如果说它“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那末,相反地,这种情况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

^① 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冯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生革命”。^① 历史已经证明,不是任何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发展,都必然走上资本主义之路;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商品经济形式都能成为社会历史转变中的革命性因素。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并不取决于商品经济形式的兴衰,而是取决于新性质的生产力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旧有生产基础的性质。

第三节 中国历史之谜

古老的中国曾一度跃居于古代世界文明古国之首,其经济的发展也令人赞叹不已。18 世纪古典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之一,魁奈曾高度称许中国“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的范例”。^② 可是,当近代世界各国先后完成了自身结构的转变而进入更高的社会经济形态时,中国却迈着艰难的步履原地踏步。这一历史之谜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不少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等等,都试图解开这一中国之谜。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把商品经济形式作为基本的标志并从既定的演绎框架出发,使他们未能深入理解引导这一历史转变的本质要素。美国学者罗·威廉曾指出,在试图解开中国历史之谜的诸多理论假说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西方历史地理学派。^③ 他们以西方中世纪城市的发展为依据,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城市结构的假说,认定中国商品经济因素发展不足。这种假说所描绘的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较少地显示出历史真实性,而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思想模式去印证他们关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在这种理论假说的影响下,人们在探寻中国历史之谜时,就会有意无意地认为遏止近代化转变是中国原有经济结构的一个固有特性。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1019页。

② 《魁奈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96页。

③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 - 189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 - 4.

这样,当人们无视中国几千年经济不断发展并一度繁荣兴盛而位居于世界之首的史实,反而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因素十分微弱,从而把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缓慢的原因,主要归于商品经济形式的不发展时;当人们离开近代中国所处的具体历史背景,而简单地从中国原有结构本身去寻找所谓“停滞性”和“排它性”时,便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错位。这种错位,一方面在分析列强侵华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时,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理论悖论:外来力量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商品形式的发展,怎么又会同时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阻碍因素呢?另一方面,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结构转变的问题上,以“停滞—冲击—激变”为基本思路而产生了形式各异的诸多论说。且不说这些观点在理论分析上以社会表象代替本质要素所产生的偏差,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以既定的理论假设取代了真实的历史基础。在这种理论前提下,不可能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作出本质的回答。

从清代以来,以至在鸦片战争后整个近代史进程中,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处于何种状况、走过了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性质;究竟是中国经济结构生而具有所谓“停滞性”和“排它性”的特质,使得中国的近代化转变受到阻碍,还是这种落后状态,仅仅是在近代世界格局的激变中所出现的一个时期的历史现象?为此,有必要根据历史资料,对中国清代以来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并对商品经济形式发展与社会结构历史转变的关系,试作应有的理论说明。

第二章 鸦片战争前清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

第一节 清代商品经济的扩散化发展道路

如果说,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严密控制下的商品经济,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基本上一直依附于封建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主要职能是服务于社会上层的奢侈性生活需要的话,那么,这种状况到清代已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它以强烈的农村扩散化趋向走上一条颇具特色的历史发展道路。

一 小商品生产两个过程的融合

在生产上,这一发展道路一是农业生产向商品性生产的转变,一是手工业商品生产向农村化、家庭化的扩展。这两个过程融合在一起,把中国的小农几乎毫无例外地卷入了商品经济的体系之中。

首先,为市场交换而进行的经济作物的种植日见普及。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桑基鱼塘和果木种植基本上已成为两种主要的农业商品性专业生产。^① 在福建“始辟地者,多植茶,蜡、麻、苧、蓝靛、糖蔗、荔枝、柑橘、青子、荔奴之属,耗地已三之一……今则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由

^① 叶显恩:《略论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商业化》,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